



中华民族价值导向的选择

先秦义利论及其现代意义

张国钧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B220.5
6

94638

中华民族价值导向的选择

——先秦义利论及其现代意义

张国钧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民族价值导向的选择：先秦义利论及其现代意义 张国钧 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ISBN 7-300-02132-8/C · 143

I. 中…

I. 张…

Ⅰ. 先秦哲学-研究

N. B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1152 号

中华民族价值导向的选择

——先秦义利论及其现代意义

张国钧 著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75 号 邮码 10087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47 000 册数 1—2 500

定价：12.50 元

序

罗 国 杰

义利问题是一个对经济、政治、伦理以至整个社会风尚起导向作用的问题。在理论上，“义利之辨”在整个传统思想中贯穿了几千年、争论了几千年；不仅如朱熹所说，是“儒者第一义”（《朱子文集》卷二十四），而且在墨家、法家甚至道家思想中，都是一个核心的、或者说是基本的问题。“见得思义”、“见利思义”、“义以为上”、“义然后取”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一直是人们崇尚和追求的。在典章制度上，古人重视道德对于社会管理和政治统治的作用，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和朝代还崇尚仁义，主张以道德治国，形成了“居仁由义”的传统。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形成了深沉博大的民族精神，涌现出一代代为国为民英勇奋斗直至流血牺牲的民族英雄；甚至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都崇尚道德、弘扬仁义，形成了淳朴厚道的民风。这后两方面也都从社会实践中折射着传统义利论的光辉，表现着义利问题的地位和作用。义利问题是极其重要的。

今天，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义利问题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当然，“义”和“利”的内涵都不同于传统社会，但是，义利关系依旧存在，义利问题仍然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一种法制经济，更应当是一种道德经济，即它不但要求社会主义法制的制约，而且应当受社会主义道德的制约。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整体观念和大局意识，个人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整体利益的原则，仍然应当是我们国家的价值导向。个人的正当利益应当得到保护，但我们必须要抵制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腐朽思想对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的腐蚀。因此，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弘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同时，有必要对传统义利论进行分析清理、借鉴吸收。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主体性，优化、强化并坚持我们的价值导向，即需要建立当代中华民族的现代义利论。这不仅是由于，现代化建设是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的全方位的现代化，因而要求有现代化的价值导向与之相适应；也是由于，现代化建设作为一场社会革命，一刻也离不开一定的价值导向的促进和引导。并且归根结底，任何国家和民族进行现代化建设，只不过是为了趋近和实现一定的价值导向，也可以说，一切现代化建设都是实现一定的价值导向的途径和手段。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而幅员辽阔的大国，置身于世界上激烈的经济竞争、汹涌澎湃的科

技革命浪潮和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要进行现代化建设，正确的价值导向的问题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基于思想传统和历史背景，顺应时代要求，建立现代义利论，乃是“顺天应人”之举。

在上述这双重意义上，张国钧同志的这部著作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本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经专家审查评议和答辩委员会审查答辩，被认为抓住了思想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从新的角度、运用新的方法，从多层次多角度入手，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讨论，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独到而又精当的观点，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答辩通过之后，张国钧同志又虚心听取指导老师、论文审查组专家、论文答辩委员会专家的意见，做了严肃认真的修改，使本书的内容更加充实，材料更加丰富，逻辑更加严谨，文风更加简洁而流畅，进一步提高了理论水平，增强了现实意义。

通观全书，可以感到，作者通过对义利问题的考察，明确地认识到，义利论不是一般的伦理学说，而是中华民族的价值导向论，是中华民族探索和确立价值导向的历程，进而探讨了义利论对于中华民族确立价值导向、塑造民族精神所起的作用及其具体机制。对中国古代义利论的研究，不是去“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批判的扬弃，吸收其精华，排泄其糟粕，并根据时代的要求，赋予

其新的意义。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下，作者力求把传统义利论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现代义利论”的新课题。这样的探讨和论述，在当前的理论背景和现实情况下，是很有意义的。

目 录

序	罗国杰 (1)
引 论	(1)
一、一个理论焦点	(3)
1. 联系不同学派的“枢纽”	(3)
2. 重大问题深处的焦点	(4)
二、一个历史关键	(7)
1. 统驭民俗生活	(7)
2. 支配制度选择	(10)
三、时代的呼唤	(13)
1. 优化和强化价值导向	(14)
2. 正视传统义利论	(17)
四、视角与方法	(18)
1. 力求三层面统一的视角	(18)
2. 方法	(20)
第一章 义利探微	(25)
一、文字上的本义	(25)
1. 义的本义	(26)
2. 利的本义	(28)

二、多方面的表现	(28)
1. 从经济层面看	(29)
2. 从法律层面看	(31)
3. 从社会层面看	(33)
4. 从历史层面看	(34)
三、价值内涵	(36)
1. 义是道德价值	(37)
2. 利是物质价值	(38)
四、伦理规定	(42)
1. 义是人之为人的应然之则	(44)
2. 利是主体谋求的目的和结果	(46)
 第二章 义利问题三要素	(51)
一、义利活动	(51)
1. 统一的活动形态	(51)
2. 义利活动的特性	(54)
二、义利关系	(55)
1. 广义形态	(55)
2. 狭义形态	(59)
三、义利论	(61)
1. 义利论与义利观	(62)
2. 义利论与伦理学	(63)
 第三章 先秦义利论的发生	(65)
一、逻辑前提	(66)
1. 劳动	(66)
2. 语言	(69)
3. 主客体分化	(72)

4. 利益分化	(75)
5. 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	(77)
二、历史环节	(79)
1. 潜在的义利要素	(80)
2. 朦胧的义利追求	(82)
3. 形象的义利感知	(85)
4. 初步的义利观念	(89)
 第四章 先秦义利论的理论形态	(94)
一、儒墨之争	(94)
1. 儒墨之沉浮	(95)
2. 何谓义利	(97)
3. 义利关系	(103)
4. 价值标准	(107)
5. 根本目的	(112)
二、儒道互补	(117)
1. 道家义利皆抛的特征	(118)
2. 功利与超功利	(122)
3. 整体与个体	(129)
三、儒表法里	(137)
1. 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	(138)
2. 法家全力维护君父秩序	(140)
3. 何以会儒表法里	(145)
 第五章 先秦义利论评要	(155)
一、四家的理论得失	(155)
1. 儒家的得失	(156)
2. 墨家的得失	(160)

3. 道家的得失	(161)
4. 法家的得失	(165)
二、四家的历史命运	(169)
1. 命运各异	(169)
2. 成因浅析	(171)
第六章 先秦义利论综论	(181)
一、从儒家义利论看其特质	(181)
1. 先义后利	(182)
2. 以义为利	(187)
3. 以义为利何以可能	(190)
二、重公利的共性	(194)
1. 儒家旨在双重公利	(194)
2. 墨家追求真正的公利	(195)
3. 法家维护统治阶级之“公利”	(196)
4. 道家契合了天下公利	(197)
三、理论地位	(199)
1. 从天人论看	(199)
2. 从人我论看	(202)
3. 从修养论看	(207)
四、历史影响	(211)
1. 在思想史上的影响	(211)
2. 在社会史上的影响	(220)
五、几点启迪	(229)
1. 反映并引导社会变革	(229)
2. 力求理论、制度、民俗的统一	(230)
3. 增强理论的开放性	(231)

第七章 义利论·价值导向·民族精神·····	(233)
一、义利论是特殊的价值论·····	(233)
1. 特殊的把握方式 ·····	(233)
2. 特殊的宗旨 ·····	(235)
3. 特殊的问题 ·····	(236)
二、确立民族价值导向·····	(239)
1. 规范评价 ·····	(240)
2. 指导选择 ·····	(242)
3. 整体定向 ·····	(246)
三、塑造民族精神·····	(250)
1. 化为语言之魂 ·····	(250)
2. 确立赏罚规则 ·····	(254)
3. 形成稳定发展的机制 ·····	(257)
4. 强化民族凝聚力 ·····	(259)
第八章 现代义利论刍议·····	(263)
一、顺乎历史必然与人民需要·····	(263)
1. 理论的活力与生命力 ·····	(264)
2. 时不我待 ·····	(267)
3. “顺天应人” ·····	(270)
二、贯注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	(271)
1. 时代精神的“灵魂” ·····	(271)
2. 民族精神的“基因” ·····	(272)
3. 现代义利论的文化—哲学基础 ·····	(274)
三、坚持辩证的义利统一·····	(275)
1. 义、利的对立 ·····	(275)
2. 义、利的统一 ·····	(279)
3. 坚持辩证的义利统一 ·····	(282)

四、义利统一的现实表现.....	(285)
1. 理想与现实	(285)
2. 稳定与发展	(286)
3. 道德标准与生产力标准	(287)
五、义利统一的现实起点.....	(290)
1. 利益导向的主要内容	(290)
2. 利益导向的实现机制	(295)
3. 从利益导向到义利统一	(299)
跋.....	(302)

引 论

每个民族和国家要谋生存、求发展、图富强、争自由，都不能没有有力的精神支柱、巨大的精神动力。为此，就不能不从民族精神的深度、从时代精神的高度、从继往开来生生不息的远景上，选择和确立民族价值导向。常规发展时期，是如此；在社会变革中，尤其如此。

世纪之交，中华民族正处在一场深广的社会变革中。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古老的中华民族正在焕发出青春活力，中国的社会面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场空前惠后的伟大变革必不可免地会遭逢一系列的艰难险阻，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的流弊与失误，这是本该避免也可以避免的。其关键之一在于，要有正确而有力的价值导向。

于是，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形成了一个内在要求，提出了一个迫切任务：凝聚当代中华民族的价值导向包括道德价值导向，以期为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胜利推进，提供一种重要的精神支柱与精神动力，从而克服种种艰难险阻，预防和清除种种的流弊与失误。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又是迫切的实际需要。它的成功解决，对推进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会是一个保证；对 21 世纪的中华民族，会是一种福祉；甚至对全人类，也许不无启迪。

于是，在几年来的思索中，我不期而然地走向了中华民族的

传统义利论。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义利论以其深刻的内涵与独特的贡献,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浇灌了灿烂的华夏文明,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导向,至今仍有深刻而多方面的影响;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中,它一再遇到严峻挑战与激烈批判,乃至受到彻底否定。但是,真正以科学、历史的态度,认真清理这笔文化遗产,成功地清除其中业已丧失生命力的积垢,继承发扬其中具有永恒性普遍性价值的精华,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当中华民族向21世纪迈进之际,当古老的华夏文明依然闪烁着深邃的魅力而令东西方的不少有识之士心向往之之际,当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精神资源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与社会发展^①之际,当世界舆论纷纷预言,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世界经济的重心将由大西洋移向太平洋、由太平洋西岸移向东岸之际,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价值。从而,顺乎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从中国传统义利论中寻求历史借鉴、汲取精神滋养,便具有了诱人的理论魅力和珍贵的精神价值。

在中国传统义利论中,先秦义利论又有特殊的重要性。这促使我选择了中国先秦义利论,力图从民族价值导向的选择与确立这个角度,在古代社会的大背景下,在先秦时代的大变革中,在先秦伦理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大系统中,对先秦义利论的发生发展、理论形态、总体特征、文化地位等方面,进行历史的、逻辑的考察;并根据社会历史必然与人民需要,对创立中华民族的现代义利论,进行初步探索。从而为当代中华民族确立自己的价值导向,提供一种历史的与理论的参照。

^①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促进了日本与“东亚四小龙”的起飞,大体上有两种主张:承认、反对。我同意前者。

一、一个理论焦点

义利论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以其普遍性把众多不同的甚至截然对立的学派联系起来，以其深刻性把一系列重大问题联系起来，是一个理论焦点。

1. 联系不同学派的“枢纽”

在义利问题上，中国古代不同思想和学派的观点与态度各不相同。或互相传承，或彼此补充，或尖锐对立。由此激荡成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义利之辨”，成为把不同思想与学派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的“枢纽”。

比如，在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中，有的学派有明确而系统的义利论（如儒、墨）；有的则只有不完全的甚至很片面的义利论（如法家）；有的似乎并没有（如道家）。但它们都从特殊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道德价值论，以特殊形式表达了自己特有的义利论。当时并称显学的儒墨两家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义利论展开的；即便是儒道两家之对立而互补的关系，儒法两家一表一里而互相补充的关系，也是如此。汉代以后，随着儒家取代其他各家而独居一尊，儒家先义后利的价值论也在理论上占居了统治地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董仲舒关于“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观点也就成为官方价值导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宋明理学与反理学的对垒中，关键的一环正是义利之辨；理学内部，各派之间差异颇大，但贵义贱利乃至存义去利的基本主张则一脉相承，并且共同把义利之辨发展为理欲之辨。明清之际，一些进步思想家对儒家传统展开批判，特别是猛攻宋明理学，关键之一同样是义利之辨、理欲之辨。近代以来，在民族危亡之际和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在与之伴随的思想启蒙与思想革命中，义利之争在不同的政治派别与思想流派手中，

又成为解除民族危机、实现国强民富的思想武器之一。

可见，义利论不仅“乃儒者第一义”（《朱子文集》卷二十四），而且在中国思想史乃至社会史上打下深深烙印的道家、法家、先秦盛极一时此后却几成绝响的墨家，都与义利问题有不解之缘，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义利论。无怪乎程颢如此论断：“天下之事，惟义与利而已。”（《二程遗书》卷十一）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张岱年先生的这个判断：“中国古代伦理学说可以分为道义论与功利论两大派别。”^①历史上的义利之辨或显（比如在儒墨之间、在宋明理学内部各派之间及其与反理学派之间）或隐（比如在儒道之间、儒法之间），但都因此使同一学派在统一中显出差异，使不同学派在对垒中又互相联系，使中国传统义利论蔚为大观，并使之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2. 重大问题深处的焦点

对义利论的关键地位，要是超越于不同学派的分歧与论争之上，就不同学派从不同角度共同讨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去看，会显得更加清楚些。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有一系列重大问题。除义利论外，择其要者有，天人论、人我论、人性论、才性论、知行论、纲常论、公私论、忠功论、修养论、义务论、良心论、德政论、王霸论，等等。正是这些重大问题的纵横交织，才构成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那蔚为壮观的宝库。义利论作为道德价值论，自然会渗透于那些问题的讨论中。下面，姑且以天人论、人性论、德政论三者为例，略加阐述。

在天人论即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学说中认为，天道决定人道，人道来自天道（尽管各家各派赋予这对概念的内涵不同）；人只要努力，就能够体认和履行天道，进入天人合一的胜境，只不过得经

^① 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